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PEARSON

全球视角的 宏观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
教学参考书系

[美] 杰弗里·萨克斯
费利普·拉雷恩 著
费方域 等 译



格致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全球视角的 宏观经济学

[美] 杰弗里·萨克斯
费利普·拉雷恩 著
费方域 等 译

当代经济学参考书系
当教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美)萨克斯,(美)拉雷恩著;费方域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 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ISBN 978—7—5432—2202—1

I. ①全… II. ①萨…②拉…③费… III. ①宏观经济学 IV. ①F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641 号

责任编辑 李 娜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美]杰弗里·萨克斯 著
费利普·拉雷恩 著
费方域等 译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www.ewen.cn)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43.5 插页:5 字数:873,000
--	--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MACROECONOM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1st Edition, ISBN: 0131022520 by SACHS, JEFFREY D. ; LARRAIN, FELIPE B. ,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Copyright ©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RUTH & WISDOM PRESS, Copyright © 2012

本书经授权译自英文版 *Macroeconom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第1版 ISBN:0131022520

杰弗里·萨克斯 费利普·拉雷恩 著

Pearson Education, Inc. 和 Prentice Hall 1994 年出版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Pearson Education, Inc. 许可,本书任何一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复制或传播,如电子、机械方式,包括影印、录制或任何信息储存恢复系统。

简体中文版由格致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 - 2004 - 220 号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宏观经济学与开放的中国(序)

樊 纲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与费利普·拉雷恩合著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已经问世五年了,五年中,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国际上许多大学和研究院的经济系以及国际组织作为主要教科书采用,加上它政策针对性强,表述清晰易懂,也被许多国家宏观决策机构作为主要参考书加以使用。今天这本书有了费方域教授翻译的中译本,相信它也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产生影响。

费方域教授执意请我为本书作序。作为一名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我倒想借本书面世的机会,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地位、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特殊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等等,作一些讨论。这里将要涉及的问题,有许多是在我国的经济问题研讨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有一些则是新出现的。在这些讨论中,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这本由“西方人”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与我们现实问题的相关关系。

1 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或许是由于对经济学体系以及宏观经济问题本身缺乏全面的理解,或许是因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一切经济问题都是由“中央”决定的问题,都是要在“五年计划”或“十年规划”之类的“宏大体系”中讨论的“全局”问题,在以往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讨论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把各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统统都说成是“宏观经济问题”的现象。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一些人往往把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比如“体制改革”)、微观经济学的问题(比如“企业债务”,或者“经济结构”问题)、增长理论的问题(如“技术进步”),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如“地区差距”)也都“扯”了进来。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是不相关的(它们都是同一经济现实的不同侧面),也不是说把他们“扯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没有特殊的意义(许多重要的结论往往是从不同理论的“结合部”中产生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先把每一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搞清楚,没有对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抽象把握,我们的理论就很难前进。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理论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考虑到以上的这类问题,我想还是有必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内涵及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区别与关系再作一简要的说明(这里用了“再”字,是因为笔者的确在不少场合都力图说明这个问题)。在本节中,我们着重分析微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在后面的两节中,我们将分别研究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1.1 宏观经济学的特殊研究角度与范围

其实,宏观经济学不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而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特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多面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解析。在我们的讨论之后读者们其实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其实是很“小”的、很窄的。

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可以归结为在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所要求实现的收入平等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率。而“效率”的概念说到底指的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状态,效率较高则意味着同等数量的资源因配置状态不同而使人们得到较大的福利。因此,效率广义地说都可称为“配置效率”。但具体地说,效率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生产效率,即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配置以达到投入产出关系的最优,实现“成本最小化”,达到最为“节约”的效果;第二,(狭义的)配置效率,即当前的生产活动(供给)如何与当前不同的需要相适应,以产生最大的福利;第三,“跨时期效率”(有时也可称“动态效率”),这指的是:人们在任何时点上都不仅会考虑今天的消费,而且会考虑明天的消费,不仅要算计眼前的收入,也要算计未来的收入;从社会的角度说,今天要为明天积累,生产能力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才能增长,同时也要使每一时期的社会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以达到

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波动”是跨时期无效率的，因为经济过热时期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紧接着发生的“紧缩期”的资源闲置，会使长期内社会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此外还有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提出减少波动、稳定增长的命题，加以研究。

针对我们这里面对的特殊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以下的定义（定义在任何时候都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由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关系，研究能够减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调节政策，以改进经济的“跨时期效率”。

1.2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中包含着有关经济效率、经济行为的一般理论，但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的问题。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和产业之间的“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表现为各市场之间的“一般均衡”）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宏观经济学严格地说既不研究“企业亏损问题”，不研究生产缺乏效率或投资缺乏效率的问题，也不研究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调”问题。这丝毫不说明这些问题不重要，只是它们不属于宏观经济学这个理论分支的研究范畴。中国过去由于是计划经济，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并不是宏观经济学的事。现代宏观经济学也要从研究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等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入手解释宏观现象，但它研究的是个别行为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的问题，比如消费与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等与“跨时期效率”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结构瓶颈”之类的问题。将这两类问题在研究和讨论时适当区分开，而不是一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就把这些问题都扯进来，是我们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完成的一门“功课”。

过去有人认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短缺或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原因又在于“企业无效率”、“投资无效率”。这些无效率的问题当然可能严重存在，但它们在一种特定的体制下可能长期存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存在，通货膨胀低的时候也存在，而且通货膨胀不是什么时候都发生，同时，我们在一两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可能把通货膨胀压下去，而在这一两年内我们的企业效率却可能根本无所长进，甚至还会进一步恶化。这些都说明，生产效率与投资效率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此是微观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制度条件和微观效率条件下，也就是在给定的总供给能力（而不是实际的总供给）条件下，研究由需求的波动而引起经济波动（即实际总供给波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短期内”采取措施尽可能快地克服波动的问题。如果把这两方面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我们也就没有必要

区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了。

相似的一个现象是,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把宏观经济的波动归结为“结构失衡”,认为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了通货膨胀。别的国家的情况我们不去讨论,就说我国这些年来来的情况。我们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什么时候“合理”过?经济过热的时候不合理,经济过紧的时候也不合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家都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解释一段时期内的“过热”和另一段时期内的“紧缩”?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能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我们却能在一两年内克服通货膨胀,可见它们客观上是有区别的,是两方面不同的经济关系,因而也要由不同的理论分支来分别加以分析。不是我们硬要作这样的区分,而是事实上它们可以区分开来加以分析(当然这不等于说它们之间没有联系)。经济结构的问题在理论上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只有在长期中才能实现调整的“配置”问题,而经济波动则属于在短期内可以调整的“总量”关系问题,只有它才是宏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

1.3 增长理论与宏观理论

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研究如何改善“跨时期效率”的问题。但与宏观经济学相比,增长理论研究角度的特点是:

第一,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为最优增长率的问题。比如,在给定技术进步速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条件下,何种储蓄率是“最优的”,能保证与最大福利相适应的最优增长。这里所说的“长期增长率”,指的是增长的“趋势”(trend),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本期“潜在增长率”,而不是现实的实际增长率。增长理论不研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波动”问题,那是宏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经济为何以高于最优增长率或低于最优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为什么会发生“过热”或“失业”(萧条),并从中寻找“熨平”波动、实现最优增长的办法。在宏观经济学中,长期最优增长率就体现在“潜在总供给”的概念当中,作为一个给定的(假定的)参照系。正因如此,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而宏观经济学则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尽管一个“短期波动”的周期可能也要持续几年,但从问题的性质来说,它的时间“跨度”毕竟较小。当然,它必须放在长期的背景中加以探讨,不然甚至无法判定什么是可持续的、潜在的增长率,但那仍然只是一个“背景”,而不是问题本身。现代宏观经济学中,这种动态背景已越来越明确。正如萨克斯等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那样,跨时期动态理论的分析(“跨时期预算约束”、“两代重迭”、“预期”等等)已作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得对波动问题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趋势背景”,但从性质来说,在全书中“增长趋势”仍然具有参照系的意义。

第二,增长理论研究的都是“真实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收入、消费、储蓄、投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等,而宏观经济学则更进一步研究“名义变量”,如

货币、金融资本、信用、通货膨胀、汇率等等,以及它们与真实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像货币这样的“名义变量”就没有宏观经济学。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真实变量的关系,价格也都是实物意义的相对价格,供给总是等于需求,所以也就无法解释许多经济波动的现象。如果说仅仅引入“投资收益预期”及“价格刚性”一类因素就可以解释失业现象的话(凯恩斯),那么如果没有与货币和信用相关的名义变量的引入,就根本无法解释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这本书中萨克斯多次分析“预算约束”问题,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说明名义变量若偏离了(大于)实际变量(发生宏观意义上的“预算软约束”),会使宏观经济发生怎样的后果。在宏观模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货币量与作为“事前变量”的总需求联系起来,也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到“经济过热”是由货币购买力即总需求大于作为实际变量的潜在总供给所引起的。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名义变量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才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要使用了纸币,^①同样会发生“短缺”(即有钱买不到东西)或“通货膨胀”一类由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发生偏离而引起的现象。

在我们的一些宏观经济研讨会上,经常听到人们讨论诸如如何使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可持续增长”一词已经有了新的特定的涵义即“环境保护”,不过我们还是在古典的意义上使用它),比如如何鼓励储蓄的增长而保证经济的增长;进而还常有人讨论“技术进步”、技术改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但其实这些都应属于增长理论的范畴,而不属于宏观理论。这里的差别在于,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通过调节当前的储蓄以调整“本期”的消费需求,或如何通过调整当前“技改投资支出”以改变“本期”的投资需求,那么这些问题属于宏观理论问题;但如果我们讨论国民储蓄或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为了讨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那这些范畴就应属于增长理论。它们之间当然有关系,但同样的事物却处在不同的经济关系当中,由不同的理论来加以处理。

与增长问题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特例,因此,它比一般的生长问题更加具体,同时也更加综合。因为它除了包含增长问题之外,还包含着体制转轨(问题不一定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如何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和“结构转型”问题,如工业化或非农产业化的问题、地区差异问题、要素流动问题等等,也包括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比如在金融深化与结构调整过程中如何保持宏观稳定等等。再进一步还包含国际经济学的问题,因为发展的问题是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而所谓“落后”是因为有了“先进”的存在,现代化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赶超”的问题,就是在已有“强手”打压的国际市场上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自己,使发展水平赶上先进国家,达到“一致”(convergence)的问题。总之,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落后国家”的一套理论。

^① 在使用实物货币如金银的条件下,若金银产量突然发生变化,而物价没有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也会发生需求拉动的经济过热(即增长率过高)。

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问题经常容易与“宏观经济问题”混到一起。比如结构转型问题,具体地说比如工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等等。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时期农业比较利益较低,农业稳定增长缺乏稳定投入的基础,因此经济发生波动,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并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当农业波动引起宏观波动的时候,当然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对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农业发展问题和工农业比例问题,本身不是宏观问题,因为它们是只有在长期内通过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发展等等才能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抵消一部分由其产生的波动,却不可能靠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

总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宏观经济”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其实是很有限的、很“窄”的(它的任务也不是研究下面要分析的制度因素,虽然它必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开)。说得极端一点,它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熨平”波动(fine-tuning)这样一个“窄”问题。它的目的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跨时期效率”,但那也不过仅仅针对整个跨时期效率论题中的一部分问题,即所谓的“短期内熨平波动”的问题,而不是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图0.1就试图对此作一直观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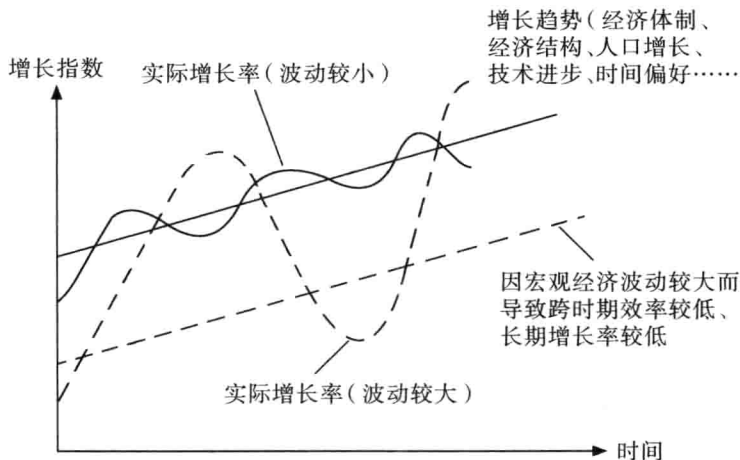


图 0.1

2 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

在一个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经济当中,人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稳定(广义地,“制度”还包含着文化和传统,但我们仅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制度)。

在这当中,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一般原理与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体的制度条件下应用经济学现有的原理和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

2.1 一般原理与特殊制度条件下的特殊理论问题

经济学理论体系内的分工,导致了“制度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它是把过去很长时期内人们通常假定为“给定的”一个基本经济因素,即“制度”,当作研究对象本身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分支学科,着重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除制度经济学以外(它假定其他一些基本因素是“给定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发展,总是在假定“制度”为给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比如现在我们读到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基本上都是由西方人在给定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特定制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萨克斯在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政策结论,自然也具有其特定制度条件的局限性,不可轻易照搬。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的。过去我们由于盲目地照搬了一些人家在其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政策,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这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但是,是否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中就不包含着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一般原理”了呢?或者,再进一步,我们在自己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的研究成果和政策结论,就与一般的基础理论无关了呢?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表明不同的体制下产生的问题要求有不同的理论模型加以分析。大量的事实表明,不同的经济体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变量之间的特殊关系上,更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特征上。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理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都是不同的:在“硬预算约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失业”,是需求不足,是如何进行“扩张”;而在“软预算约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常态”问题则是经济过热、投资过度、“短缺”、“通货膨胀”,是如何“控制”总需求,防止总需求的扩大。这的确在理论上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求在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一些特殊的理论模型与理论工具,以利于政策分析。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总需求管理的分析,迄今为止都要从“乘数理论模型”开始。但是整个这个理论都是以“失业”为前提的,因为乘数效应只是在经济中存在过剩生产能力的时候才起作用。它适用于“硬预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情况,却不能直接应用于分析我们的情况,因为当总需求已经大于潜在总供给(总需求膨胀)之后,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原则上只能导致(1)通货膨胀,(2)收入分配的改变(通过某种特殊支出的扩大,如财政支出、投资支出),而不能再使总供给或实

际总收入有所扩大。这就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理论模型来加以分析。比如用一个总需求扩大的“支出扩张模型”(见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来描述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变化或各地区、各部门或各企业之间的“货币竞争”关系,如何导致总需求膨胀与收入分配的改变(见图0.2)。它与乘数模型的“对称性”在于:在失业条件下,正的45度线表明需求的扩张,导致收入增长;而在“过热”(总需求大于潜在总供给)的条件下,用负的45度线加以分析,既有利于表明潜在总供给的约束[图0.2(b)中的斜线 Y_s],也有利于表明这时需求扩张的结果不过是收入分配的改变(乘数模型可以表明通货膨胀,但不能表明收入分配的改变)。这一模型可能更直观地表明公有制经济中总需求的变动往往是由特殊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引起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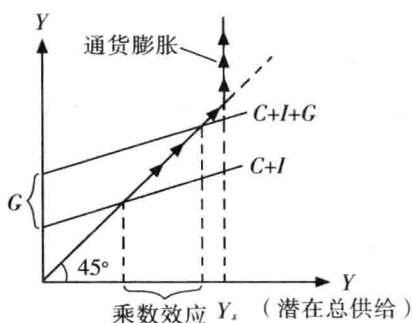


图 0.2(a) 乘数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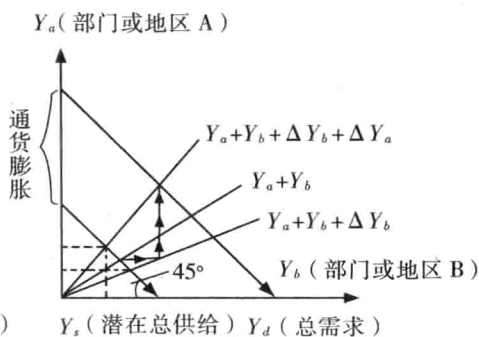


图 0.2(b) (计划经济下的)支出扩张模型

这个例子说明:第一,特殊的经济体制会产生特殊的经济问题,需要用特殊的理论模型来加以分析;第二,这种特殊的理论不否定其他理论模型的特殊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说明在其他制度条件下的特殊问题;第三,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特殊经济条件下发展出新的理论模型,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第二个例子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表明特殊理论中包含着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IS-LM模型,它使我们可以以利率(i)和总收入(Y)为坐标的平面图上,描述利率、投资、储蓄、流动性以及总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可以在这一模型中分析各种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个模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利率机制”。首先,投资和储蓄的大小取决于利率的高低(IS 曲线),而财政支出的变化会引起利率的上升,从而会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其次,货币量的变化会因流动偏好的作用而导致证券市场上利率的变化,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LM 曲线),这构成货币政策对总产出产生影响的原因。但是,在我们的体制条件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大量的事实和理论分析告诉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着“预算软约束”,这一约束的具体涵义就是“亏损了可以继续生存”,结果便是投资可以不计成本,不计风险;于是,在本金都可以不还的情况下,利率的变动(边际变动)对投资的影响就很小了。就是说,在理论上,投资的利率弹性等于零,在任何一种利率水平上,投资需求都可以是无穷大的。于是,在几何图形上(见图

0.3),我们就有了一条“垂直的” IS 曲线,投资的大小,只取决于“投资政策”,或曰对投资的“直接控制”,而不论利率的高低。这时的财政支出也不会产生什么“挤出效应”(IS-LM 模型的基本形态假定物价水平不变,因此通货膨胀的“排挤效应”不在图上显示),只是在需求上又加了一块或少了一块而已(垂直的 IS 线的“左右”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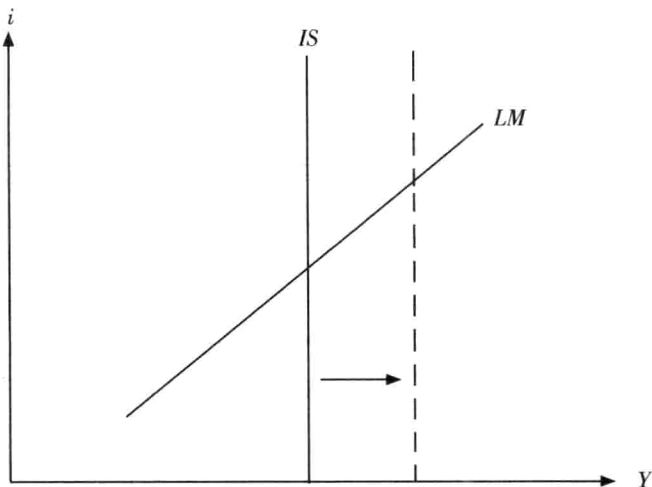


图 0.3

这么一个“奇形怪状”的 IS-LM 图其实还没有充分表明我们体制上的特点,因为我们暗含的一个假定是货币需求仍是收入与利率的函数,并假定利率是可变的——至少在“黑市”或“灰市”上是可变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不存在资本市场或“利率固定不可变”这么一个更为具体的体制因素, LM 曲线就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这一分析的政策结论显然是:在公有制预算软约束的特殊条件下,利率机制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适用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而只有通过投资(对支出)的直接控制,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① 想想我们过去在传统机制下,每次都是由于投资膨胀而引起经济过热,然后每次又都是直到中央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削减投资,才使经济“冷却”下来,就能说明这一道理。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在西方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理论,的确不能直接解释我们特殊体制下的特殊问题,而必须改变制度前提,将一般的理论框架放到特殊的制度条件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宏观政策也必须依具体的体制条件而定;但是,第二,那些分析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本身具有一般性,我们虽然不应轻易照搬别人的“政策结论”,但仍可以利用具有一般适用性的理论模型作为框

①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预算内财政已经成为一种“吃饭财政”,已没有多少能力来顾及宏观调控,但在另一方面,我国还保持着中央政府对投资活动的一定控制。所以在现在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两类政策手段构成: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这也可以算是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特殊性的一种表现。

架,创造性地分析我们特殊的经济问题。

2.2 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新的体制正在逐步形成。研究宏观经济的特殊制度基础,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体制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第一,改革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也还远不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正因如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许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在我们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事实上还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突出地体现在:对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行政纽带运转的国有经济部门而言,目前还仍然只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来加以约束,在地方与企业还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还必须保留一定的“外部约束”或直接控制。一种经济体制有其自身特有的逻辑,是不得违反的。现在就一味地要用市场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来管理我们的经济,不仅会造成经济的混乱,而且也并不是真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我们的经济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目前也已不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正处在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基本特征是“体制双轨”或“双重体制”。经济体制的这种特征,显然要求宏观调控手段本身也应该是“双轨”的。单纯使用一种方法,违反事物运动的规律,实际上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这突出地表现在: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哪一种宏观调控手段,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市场的”还是“行政的”,也无论是“货币的”还是“计划的”手段,能够十分有效地对经济进行调控,但反过来说,现在各种调控手段哪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都多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综合地”使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综合调控”(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由樊纲主编的《体制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稳定》)。

在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的问题上,也经常出现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据笔者观察,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通过体制改革来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基础?有的理论家看到了不同的经济体制与不同的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就是不一样”,认为我们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就是应该永久存在下去的体制,比如,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要搞“直接控制”,就是要用行政手段,这种政策手段的体制基础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而有关市场经济的一切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一切政策,在中国永远不会有用、有效。表述的语言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总是可以从一些字里行间读出“中国就是不一样,外国的东西就是不会有用”的论点。既不要改革我们的体制,也不需要改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相应地也就不需要学习已有的经济理论,别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似乎与我们根本

无关。就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来说,我们当然还不能完全放弃直接控制和行政手段,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在继续运用这些政策工具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政策手段及其体制基础即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改变这种体制基础,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使我们的经济彻底摆脱“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恶性循环。“中国特色”当然是有的;一个国家总会有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等等,任何理论在应用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时,就是在应用于一组特殊的约束条件,由此得出的许多结论也必然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否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不能否定我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的共性。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只是一种过渡的体制,市场化进程正是要不断地对现在这种效率低下的体制进行改革,使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步成长起来,逐步地创造新的体制条件,使我们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也得到改变;现在许多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政策我们还不能用,但这不等于说今后永远不能用(当然总还是要有一些特殊的变异);现在体制条件不同因而政策选择也不同,绝不能得出“现行体制不可改、不必改”从而永远不搞市场经济、永远要用现行的政策来控制经济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体制改革的长期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性”的关系。近几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十分积极的但却似是而非的论点,那就是所谓“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宏观稳定”。这种观点充分认识到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宏观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现行经济体制,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宏观稳定,就一定要进行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持这种论点的人没有认识到,体制改革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见效的过程(想想我们这些年任何一项小小的改革都要面对多大的困难、花费多少的时间),而宏观调控则是一个短期内的“总需求调节”问题,二者不能混淆。具体一点说,宏观政策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一两年内使通货膨胀降下来的问题,而一两年内能根除现行通货膨胀的体制方面的改革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进展,即使有些进展,其积极后果也往往要到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后才能显示出来(比如产权改革与企业改革)。有人批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只是“治标”做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治标”的,不过就是一个在“治本的”体制改革还不能实现、还没有完成之前,怎样把通货膨胀压下来、把过热增长冷却下来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改革体制的问题。不能指望由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改革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任何体制条件下,都会发生“短期的”宏观问题,也就是在同一经济体制下发生经济波动,有的时候增长“过快”,有的时候增长“过慢”,有的时候通货膨胀高些,有的时候则低些。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创造新的体制基础使经济的运行更为平稳一些,但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我们总还是面临着如何在当前尚未“改好的”体制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求得经济的长期稳定”或“最终的”稳定、“根本的”稳定,这样的提法才较为正确(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新体制下也会有宏观稳定问题,只是性质和程度不一样罢了);而就当前的宏观问题而言,用改革实现稳定的论点是不对的。

这里,我们事实上又涉及了不同理论分支之间的差别问题:制度经济学是一种“长期的”理论,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的”理论。制度变革与技术进步一样,都是在长期动态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而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是短期内一些总量关系的调整。

3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3.1 “国际经济学”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分支是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最初是从国际贸易的研究开始的,进而研究外汇汇率的变动,研究资本的流动等等。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部还可以有政府控制、计划经济,而在国际上却一定得搞市场交换,研究市场机制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应适用。那么,国际经济学的特殊之处究竟又是什么?它怎么会成为一个特殊的理论分支呢?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国内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差别说到底就是一片:在国内(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生产要素至少原则上是可以流动的,而在国际上,可流动的只是商品,不是要素。

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四项:劳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技术(我们把它从其“载体”即劳动和资本中抽象出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使资本(包括货币)和技术开始可以流动;但是,土地或自然资源天然地无法流动,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是不可改变的(这属于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而劳动力则“不允许”流动,主要是不允许在贫富国家之间流动——富国不允许穷国的劳动力流到富国去抢他们的饭碗、分享他们的收入与财富,这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的主权问题。正是在这种要素不可流动性的基础上,产生了特殊的理论分支——国际经济学。一切国际经济学的特殊命题、特殊概念,说到底都是与某些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相关的,是在某些要素不可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关于市场交易和资源配置的理论。^①

所谓“开放的”经济,说到底就是商品与某些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上流动的经济,开放的程度则一方面取决于“有几种东西可以流动”,另一方面取决于“有多少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对一些国内问题的研究中,有人却忽视或排斥要素流动的作用,认识不到许多经济问题只有在资本和人口的流动中才能最终得到解决。那样一来,我们的一些国内经济问题就有变成“国际经济问题”的危险。比如关于地区差异问题的研究,如果我们排除了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的因素,我们的“东西部关系问题”,就会变得像国际上的“南北问题”那样难以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笔者所作《既要扩大“分子”,也要缩小“分母”》,《中国投资与建设》1995年第6期)。